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OE Serial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 发展报告2013

The Annual Report of China Educational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

唐亚阳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OE Serial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 发展报告2013

The Annual Report of China Educational Network Public Sentiment

唐亚阳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发展报告 2013/唐亚阳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ISBN 978-7-303-17728-8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计算机网络—应用—教育事业—研究报告—中国—2013 IV. ①G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36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228 mm

印 张: 14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策划编辑: 陈红艳

责任编辑: 陈红艳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茜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唐亚阳

执行主编：胡 凌

副 主 编：李永智 郑斯洋 杨 果 刘非凡

编委会成员：刘社瑞 阳美燕 胡朝雯 张 坤

刘明然 罗迪强 黄伟妮 周美丽

强玉环 贺艳花 吴汉华 李青鹰

李 琴 王安琪 周光俊 李北北

魏 龙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年度综述	1
一、2013 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年度环境分析	1
二、2013 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年特征分析	13
第二部分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36
专题一：《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周年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36
一、舆情事件概述	36
二、《教育规划纲要》三周年舆情特征	37
三、舆情点评	47
四、对策建议	48
专题二：高校师德师风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51
一、高校师德师风评价标准	51
二、高校师德师风网络舆情概况	54
三、高校师德师风网络舆情特征及影响	59
四、高校师德师风网络舆情形成的原因	62
五、高校师德师风网络舆情管理对策	65
专题三：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专题	68
一、舆情概况	68
二、舆情特征	72
三、舆情点评	79
四、应对举措	80
专题四：“异地高考”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82
一、事件脉络	82
二、特征分析	85
三、观点汇总	94
四、原因对策	96

专题五：高校学术不端事件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100
一、基本情况	100
二、特征分析	103
三、原因分析	110
四、建议思考	113
专题六：校园性侵害案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115
一、基本情况	115
二、特征分析	116
三、原因分析	123
四、建议思考	125
专题七：高校涉经济问题事件网络舆情专题分析	127
一、基本概况	127
二、特征分析	129
三、原因分析	134
四、几点建议	136
第三部分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的育人价值	140
一、表现形态	140
二、作用机制	147
三、实现路径	153
第四部分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指标体系	161
一、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指标体系发展概况	161
二、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指标体系赋值	177
三、基于中国教育网络舆情指标赋值的案例分析	193
四、中国教育网络舆情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评价与总结	212
后 记	217

第一部分 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年度综述

一、2013 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年度环境分析

中国的教育系统作为中国社会重要的子系统，既具有自身的结构性与系统性，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存在普遍的联系及细致的相互影响。中国教育网络舆情的环境系统由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媒介环境三部分组成。社会环境作为宏观背景决定着教育网络舆情主体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构成；教育环境决定着教育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端与消弭的基本逻辑；媒介环境决定着教育网络舆情信息的流转及影响的施加过程。

在过去四年的教育网络舆情研究中，随着对该领域的理解与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愈加明显地体会到在中观层面对教育网络舆情的梳理与剖析，无法摆脱对其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综合把握，亦即对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与媒介环境的综合评判，而这种评判应成为教育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报告第一部分将依循这种思路展开，在对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综合分析基础之上，对 2013 年全年的教育网络舆情进行特征分析，从时间分布、地域分布、议题特征、演变规律和应对表现等方面，在系统整体的层面呈现该年度教育网络舆情的发展状况。

(一) 社会环境

1.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经济领域变动的结果波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以往社会结构中各阶层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占有情况随之改变，原

有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被打破,阶层间社会流动的通道被打开,新的社会阶层逐渐产生并发展壮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新的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身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的双重壁垒阻碍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转换,因而阻碍了社会流动,强化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推动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结构的调整随即启动,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各类问题逐步积累、强化,成为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前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均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来自现有社会阶层分布的不稳定状态,阶层间社会流动仍在进行之中,所谓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尚未真正形成,不稳定的结构增加了社会转型的压力。21 世纪之初,历时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着力点集中于经济领域的调整,从设计层面来看,改革对社会领域的考虑与调整相对滞后。陆学艺认为,“目前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自然形成的,也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①。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结构转型所催生的社会阶层的自然分化与重组。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在社会流动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的结构调整。社会流动侧重垂直方向的移动,多体现为成员社会地位的升降,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则侧重水平方向的移动。陈安存认为这种移动表现为“社会成员从既有的阶层分化出来,进入与其不同的阶层或重新组合成新的阶层”^②。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的阶层间隔是受行政力量所制约和实现的,不同阶层成员的利益边界被身份、单位和行政的框架所限定。改革开放触动了作为原有社会结构根基的身份制,而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石的契约制得以广泛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中。“基于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从而引起阶层的分化”^③,因此,对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解通常建立在对职业、收入、经济资源的占有等方面的认知基础之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得到巩固,经济领域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分化告一段落,既有的社会结构日渐趋于动态的稳定状态,阶层固化的现象逐步显现并受到普遍关注。“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④,阶层固化使诸多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4)。

② 陈安存:《试论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的挑战》,载《唐都学刊》,2002(3)。

③ 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基层研究二十年》,载《社会学研究》,2000(1)。

④ 全敏、郭满:《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载《东方企业文化·金融天地》,2012(3)。



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突显,同时,受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大众化的影响,这些社会矛盾得以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心态和行为层面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基于上述因素,有学者将新世纪以来的十年(2000—2010)确立为“微观社会转型期”,并将2010年确立为微观转型的“临界点”^①。在这一临界点上,中国社会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集中显现,社会矛盾的积累极大地增加了社会风险,社会舆论对矛盾与问题的讨论空前热烈,对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面向未来而言,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消除阶层固化所产生的后果,具体表现就是消除阶层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在教育领域,社会阶层固化一方面在实践中影响和制约着教育发展,产生了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另一方面对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背离了中国教育事业设计和追求的基本目标。以大学教育为例,学者王晓红、殷艳玉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交流访谈,提出了当前面对“阶层固化”现象,大学生群体产生的生命困惑:(1)阶层固化容易使大学生产生消极的生命情感;(2)阶层固化容易使大学生轻视生命价值的追求;(3)阶层固化容易使大学生降低生命的质量^②。纵观近年来的教育网络舆情事件,关于教育不公、“×二代”现象、高考、就业等议题的事件层出不穷,背后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阶层固化所带来的不平等。

2. 中国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③。社会心态是社会群体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反应,因而具有共性的、主流的特征,它强调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倾向,不以特例作为评价对象。覃国慈的研究归纳了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宏观层面呈现出的时代特点,即“大体和谐,趋于理性,具有脆弱性,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并存且相互交织,表达方式多样”^④。“大体和谐”体现了社会心态总体的稳定性;“趋于理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脆弱性”表现了社会心态从和谐向不和谐过渡的临界状态;“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并存且交织”体现了当前社会心态的复杂性;“表达方式多样”则鲜明地揭示了在新媒体的介入下公众意见表达渠道的多元化。

社会心态决定了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内心状态的反映,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社会转型中各类矛盾与冲突纷纷显现,阶层利益冲

① 刘畅:《微观社会转型期及其临界点的确认》,载《贵州社会科学》,2011(7)。

② 王晓红、殷艳玉:《“阶层固化”现象下大学生的生命诉求》,载《学术探索》,2012(9)。

③ 李有发:《我国社会心态的变化趋向及其相关问题》,载《兰州学刊》,2009(12)。

④ 覃国慈:《当前社会心态盘点与调适》,载《新疆社科论坛》,2013(2)。

突和社会情绪的堆积与爆发,是这些矛盾冲突的核心。社会情绪大体上可分为正向情绪和反向情绪两大类。《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对当前社会情绪的总体基调做了如下概括:“正向为主,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①。正向为主表明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观仍然呈现积极和正面的倾向。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一方面表明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之间的转化难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表明负面事件多发并累积已然在社会情绪层面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情绪反向”现象,它指的是社会群体在面对社会事件时表现出与正常状态下的反应相背离的态度或行为,如本该同情却幸灾乐祸,本该指责却表示钦佩等。

有学者指出,出现这种“社会情绪反向”现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执行不严,二是社会综合改革滞后,三是社会个体成员自身素质不足^②。将“社会情绪反向”归咎于社会个体成员的自身素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个体成员素质的不足使之展现出人性中自私自利、缺乏公德和责任感的的一面,外在表现是社会成员个体痛恨“特权”但又渴望自身拥有“特权”。这种判断强调了社会个体的自身因素,却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当“特权”的获取不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社会公平失去建立的标准和评价的尺度,社会群体将自然而然地退守到对个体私利的维护中来。“情绪反向”的个案尚且可以归咎为个体素质问题,但当其成为社会群体的普遍倾向时,就只能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运行中寻找原因。学者杨宜音撰文写道:“当我不能自主或独立地做出决定时,我会感到沮丧;当我的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时,我会恼怒;把某人作为榜样要我学习时,我会很反感;当听到政府官员或权威人物告诫人们要如何做时,会让我很厌烦;规则会引发我的抗拒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测度逆反心理的量表中设置的题目……很多反映负面情绪的词汇:反感、沮丧、厌烦、恼怒,正是人在个人意志被剥夺和限制状况下的感受,同时也是逆反心理产生的重要原因”^③。用“社会群体心理逆反”来表述当前的“社会情绪反向”现象是合理的。这种心理逆反是强弱关系结构中位于劣势地位的个体面对强势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这种选择蕴含着强烈的负面情绪,而其产生的根源往往来自对强弱关系结构的不认同以及无力改变。当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固化,阶层流动的通道被堵塞时,处于下层地位的社会成员正是强弱关系中弱势的一方,群体逆反心理的产生是必然的结果。因此,“社会情绪反向”现象是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

① 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1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② 李宁:《是什么导致了“社会情绪反向”》,载《政工学刊》,2013(5)。

③ 杨宜音:《逆反社会心态解析》,载《人民论坛》,2013(7)。



结构的不完善在现实生活层面的具体体现,消除这些不正常现象也应当从机制与结构方面入手。

3. 共享的价值观:从社会信任到社会共识

治理由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不良社会心态和情绪所引发的问题,需要以一种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为支撑。共享的价值观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支持和遵从的价值观念体系,其确立对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及个体的整合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①。这种意义首先表现在通过社会信任的建立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达成谅解。近年来,教育网络舆情事件频频爆发,伴随期间的各种不良现象之所以发挥强大的负作用与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或个体之间缺少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缺失有一定的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共享价值观的缺位。

社会信任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经验长期内化的产物。对社会成员个体而言,建立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信任需要一定的过程,但从社会系统的整体来看,社会信任的建立却可以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快实现的进程,共享的价值观则成为促成社会成员维护普遍信任的道德伦理体系。建立共享的社会价值观,要求社会各阶层及成员个体在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上走向共识,这种社会共识最突出的表现是建立成员个体间的宽容与谅解。许多引发网络舆情的社会事件所反映出的矛盾与冲突,乃至其被误读甚或谬传,根源不在于事件本身性质的恶劣程度,而在于公众心中时刻持有的一种严苛的心态。对他人或公共管理部门的普遍不信任和零容忍,已经成为人们审视社会问题时最基本的预设心态,人们倾向于“宁信其恶,不信其善”,于是负面传闻甚至谣言、诬言的肆虐得以植根于此。

实现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谅解,不能寄希望于社会成员个体的自我转变。在社会共享的价值观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且社会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之时,对成员个体在伦理与行为上的过高要求,实属舍本逐末。从社会信任到社会共识,需要从法律制度、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心态引导等方面实施整体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

今日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公共议题的解决是一种协调各阶层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的过程。对立的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势必存在力量的消解,降低社会整体运行的效率。相反,当社会公共事务以社会共识为基础寻求解决方案时,不同利益

^① 涂小雨:《转型期共享价值观的确立与执政党社会整合》,载《求实》,2009(5)。

主体之间容易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解决的进程,提高社会整体运行的效率。在一些网络舆情事件典型案例中,我们常常可以得到印证,如人们在面对社会公共事务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从大局着眼寻求突破,而是一味强调各自群体的利益,并对其他群体的所谓“特权”等不公平之处过分敏感,导致态度、意见、行为缺乏理性,有失公允,使围绕公共事务所进行的探索长时间处于利益博弈状态,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同时对社会建设亦难有裨益。

网络舆情是网络舆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网络舆论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意见、观点和态度在虚拟空间的反馈。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如果不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网络舆论乃至网络舆情则会演变为不良社会心态的宣泄。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下,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是以虚拟空间信息传播的形式存在的。从本质上看,这种信息传播行为属于精神交往的范畴,同时也是一种互动行为。如果缺少共享价值观的支撑,这种互动将转变为虚拟世界的对立,当对立经过多重传播,就极易被扭曲为打上道德标签的抗争或网络舆论的审判。

在价值观日益趋向多元化的时代,建立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既需要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建设层面进行精心的设计,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反思。

(二)教育环境

1.《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三周年

2010年7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继1985年、1994年及1999年之后,中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回首过去的三次全教会,每一次会议都将国家层面的教育观念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实现新的跨越。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最重要的举措是颁布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后文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对全面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和全面动员。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有三个,一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二是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三是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方面体现了教育是民生的基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育现代化是实践现代化之基的理念。建设学习型社会旨在构建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国家,让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十几亿人民所接受,并付诸实践。进入世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目标,是为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在国际竞争中,人力资源在各种战略性资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人力资源强国战略要求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这是教育现代化目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这三项战略目标,在《教育规划纲要》发布后不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法制办、国研室、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发展研究中心、自然科学基金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20个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审议教育改革的重大方针和政策措施,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统筹协调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教育投入是国家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的战略性和基础性投资。不断推动教育事业的进步,不断提高国民教育保障能力,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早在19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经提出“至2000年实现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2012年年末,这一目标终于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4%,达到2.0万亿元。2013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2.2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的加大,进一步提升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教育改革的活力。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进一步向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倾斜,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但是,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看,中国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相对财政收入水平而言仍显偏低,GDP占比4%的突破不应是中国加大教育投入的终点,而应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从教育事业的大局来看,加大教育投入只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步,中国教育事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能只依靠加大经费投入来解决。美国教育经济学家本森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教育财政体系的三个主要指标是充足、公平和效率。充足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基本保障,而不是最终目标。国家教育财政体系运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教育经费投入所支撑的国家教育资源公平有效地配置,使全体国民共同受益。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除了扩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规模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事业运行体系,进一步加快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

2. 实现教育公平任重道远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优先发展”强调了教育事业在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性;“育人为本”指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事业的根本宗旨;“改革创新”从实施手段和路径方面点明了教育事业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质量”对教育事业具体工作的标准提出了要求。“促进公平”工作方针的提出,从权利与机会方面指明了教育事业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积极作用。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教育公平长期以来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事件、信息、言论也极易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是否实现教育公平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教育现代化

程度。学者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之所以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因为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并且能够显著地改善处于社会不利地位者的生存状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增进社会平等^①。在社会阶层分化的状态下,教育公平能够成为弱势阶层寻求平等权利的渠道,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润滑剂,也正因此,教育不公平现象极易成为公众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迁怒的对象。教育不公平现象封闭了处于社会不利地位者凭借接受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对存在阶层利益冲突的社会结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公平”的工作方针,对中国当前教育事业与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针对宏观层面,社会关注较多的是区域差距、校际差距所产生的公平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指引下,在“效率”方面投入大、效果好,但在“公平”方面做的不多,收效不明显。不论从全国范围看,还是从一座城市甚至更小的行政区划内部看,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择校热”、异地高考、城市流动人员子女入学等问题,都是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具体体现。微观层面的教育公平指学生受教育过程中权利平等的问题。2013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递交提案讨论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特困儿童和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等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微观层面教育公平问题的严重性。教育过程的公平,需要教育者因材施教,充分考虑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建立多元化的学生评价尺度,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三)媒介环境

1. 移动互联网持续发展

中国移动互联网发端于新世纪之初。2000年12月1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施行“移动梦网”计划,掀起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帷幕。此后的十年间,在互联网起起落落之间,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也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围绕着移动互联网而生的诸多无线应用形式——短信、彩铃、wap、点播等SP类无线应用因行业秩序混乱,导致大量的企业违规现象,招致大量投诉,使移动互联网一度走入低谷。

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启动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发放工作的议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依照规程开展相关工作。一周之后,第一批3G牌照被授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2009年因此被称为中国的“3G元年”,移动互联网概念再次成为热点,行业内各方力量重启竞争与扩张的

^① 杨东平:《2020:中国教育改革方略》,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进程,无序竞争、恶意敛财、色情淫秽等现象再次恶化,引发了2009年10月开始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央外宣办及公安部制定实施的整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此次手机扫黄风暴席卷全国移动互联网,其影响亦波及PC互联网领域。

近五年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在走过了脱序扩张和市场混乱的早期发展阶段之后,无论从运营商、内容提供商还是用户使用方式上看,都已逐步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法律法规等制度性规制以及管理机构、部门等组织建设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新型互联网应用方式迅速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沟通和交往习惯,也显著地改变了现实生活。早在互联网掀起Web2.0变革的时期,博客等网络媒介的兴起曾一度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带来颠覆性变革。它们对传统媒介话语权的争夺以及草根话语权的释放,曾被认为是互联网重构人类社会权力与结构的象征。时至今日,虽然博客依然是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利器,但不可否认,相对后来出现的微博、微信等工具而言,博客显然更偏向于精英式的书写和表达。微博与微信不仅具备信息传播与沟通表达的功能,其时效性也更强。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强调的社交属性使其具备构建用户网状关系结构的能力,也因此引发了新一轮的信息传播革命。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5亿,占整体网民的81.0%,并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受微信软件用户数量跃升的影响,在2013年手机网民各类手机应用使用率调查中,手机即时通信用户使用率为86.1%,用户规模达到4.31亿。随着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的强势发展,其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手机微博的影响力,手机微博用户数及使用率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3年12月,手机微博用户数为1.96亿,与2012年年底相比减少了596万,使用率为39.3%,相比2012年底下降了8.9%^①。在中国网民职业结构调查中,学生以25.5%的比例继续居于首位,这与手机网民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有一定的相关性。智能手机价格的平民化及无线网络资费的调整,共同促成了学生群体向手机网民的转化。基于上述数据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教育网络舆情工作的关注重点,应顺应舆情主体行为习惯的变化趋势,逐步由传统的论坛、博客等渠道向手机即时通讯和手机社交等渠道倾斜。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构建了用户网状关系结构,由此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人际关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zg/hlwjtjbg/201401/t20140116_43820.htm,2014-01-16。

系网络。基于数字传播技术的信息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叠加性。“六度分隔”理论揭示了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网络中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激活了这种巨大的潜能,也使之更形象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信息在技术的支持下于人际网络中高速传播和扩散,打破了以往通过关系强弱来区分的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区隔,促成了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

2. “全媒体”战略已见成效

面对新媒体对信息传播和社会生活影响力的增强,传统媒体在自身传播优势地位动摇的情况下,纷纷做出了“全媒体”战略的选择。全媒体战略是一项系统化的媒介发展战略,不仅是对信息传播的最终产品形式的“全媒体化”,更要求媒介机构从组织结构、新闻生产流程、从业者生产方式、信息传播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全媒体化的转型。

在中国,全媒体战略的实施始自报业,一些报业集团更名为媒体集团,在原有报纸产品的基础上拓展多元化的媒体终端形式,如报业网站、手机报、移动终端应用等,实现对目标受众的全方位覆盖。这些多元形态的终端产品帮助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拥有了一席之地,但并不代表传统媒体夺回了话语权,更不能代表传统媒体重回了话语权威时代。学者蔡雯曾对当前传统媒体所实施的全媒体战略发表看法,“社会化媒体的兴盛,使人们的信息交流包括新闻传播活动都能够脱离专业的媒体组织而自发运行。无线移动终端的普及还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变化,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必将越来越显著。在这种变化中,用户对于信息传受的控制权不断加大,每个人都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网络,多少人会在自己的信息网络中关注媒体组织发布的内容,并乐意在微博、社交网站上分享这些信息,关键还要看媒体组织提供的内容是否对他们有价值”^①。全媒体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供多元化的终端产品,亦非仅仅进行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的再造,而应当考量在“全媒体”表象之下的信息价值的再生产。这种对信息价值的再生产无疑将体现对新闻传播最基本规律的回归,即追逐信息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从这一角度而言,当前传统媒体的全媒体战略并未找准信息价值再生产的方向。

自互联网兴起之初,传统媒体的先觉者已经意识到新媒体对自身的冲击和影响,至博客大面积普及时,融入而非逃避新媒体的理念已开始为传统媒体所接受。Web2.0的迅猛发展态势,以及伴随着数字媒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对传统媒体依赖性的大幅下降,令一些传统媒体产生了被边缘化而不仅仅是影响力被削弱的危机感。由传统媒体阵地向数字媒体领域转移,最终实现对受众的全媒体

^① 蔡雯:《“全媒体战略”的精髓》,载《编辑之友》,2013(5)。



覆盖，成为传统媒体的共识。

全媒体传播是新媒体变革背景下传统媒体以媒介融合理念寻求自身跨界突破的新思路。中国新闻媒体的全媒体传播探索始自2008年7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的《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采编系统。该系统对内部生产制作流程进行了再造，实现了新闻产品对报纸、手机、平板电脑、网站、户外视屏等多种媒体的覆盖。此后，浙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组建全媒体新闻部，南方报业集团提出设立“南都全媒体集群”。

至2013年年底，主流传统媒体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媒体产品，其中不乏表现较好的案例。传统媒体大多已开通运营官方微博、微博，有的甚至已经开通微信公众账号，进一步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使自身与受众沟通的渠道更多元。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应用方面，虽然起步稍显迟缓，但凭借自身丰富的资源和媒介经营经验，对新媒体形式的运作显然更具后发优势，逐步摆脱了早期被动的处境，实现了由单一媒体向全媒体传播的转型。以《人民日报》为例，作为中国最权威、最主流、最重要的党报，《人民日报》在新媒体勃兴的大潮中，通过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体现时代精神和专业水准的新媒体发展之路，成为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范本。2012年，创办已逾16年的人民网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2012年7月，人民日报社开通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提出了“参与、沟通、记录时代”的口号。微博开通后，43天粉丝数量突破100万，76天突破200万，200天突破400万，11个月后超过1500万，单条微博最高转发超过20万次，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已经成为微博平台上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账号之一^①。传统媒体实施全媒体战略，从内在动机上看，源自其面对信息传播格局的变化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迫切需求；从外在影响上看，在网络舆情的领域，传统媒体全媒体战略的实施改善了以往舆情信息传播的杂乱局面，传统媒体以其专业化、可信度、导向性为网络舆情向理性和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回顾2013年的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不难发现，传统媒体积极、有效的参与，为社会公众尽快厘清新闻事件的脉络，洞悉新闻事件的真相，建立对新闻事件正确的价值判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支持，大大降低了谬传、谣言、非理性事件等现象的产生，为营造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更深层次看，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领域议程设置能力的回升，使其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大大加强，其公信力与话语权下降的态势亦有所缓解。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生的时代，传统媒体身兼三种角色——社会的守望者、利益和意见表达的平衡

① 马利：《大数据时代人民日报社全媒体战略》，载《中国报业》，2013(6)。